



FDI 与我国区域投资环境优化浅探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崔宏楷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据世界银行统计,如果把我国各省作为独立的地区来看,从197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20个地区全都在我国。作为吸引FDI的第一大东道国,区域投资环境的好坏对FDI的区位动机有着直接影响;反过来,FDI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投资环境的优化又产生着积极的效应。

一、区域投资环境与FDI区位选择

一般的区域投资环境可以理解成区域的经济系统与投资或资本流动之间的中介,是隐含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表象下面更为实在和深刻的东西。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空间布局的区域性以及地区之间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的差异性,决定了区域投资环境有其相对独立的面貌特征及变化趋势,而区域投资环境各因素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FDI的动机、方向、数量和结构,良好的投资环境发展进程不仅能吸引FDI,而且具有投资导向功能。

从因素的稳定性来看,区域投资环境主要包括相对稳定、中期可变和短期可变因素等。区域投资环境的空间差异表现为各投资环境因素在不同地区的差别和组合关系。各投资环境因素在一个地区的组合形成该地区独特的投资区位,对特定动机的FDI将产生巨大吸引力。由于投资活动在不同区域进行,其所产生的不同投资效益以及投资效益的持续性,决定了区域投资环境对FDI的影响程度。

主流FDI理论一般通过跨国公司拥有特别优势的思路,从微观角度探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决定因素和前提条件。其中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影响最为广泛。该理论首次将区位优势、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同时融入一个统一的范畴之内,增强了FDI理论的解释能力并增大了其使用范围,这一理论在东道国投资环境与FDI流动之间建立了理论联系,并揭示了东道国政府在改变区位优势资源中的潜在作用。邓宁将区位优势划分为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同时总结了四大类FDI动机,即寻求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寻求市场开拓、寻求生产效率和寻求战略资产。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研究论证了FDI在我国各地区之间进行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市场潜量及其增长率、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供应、区域位置和优惠政策是影响FDI在区域之间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与被投资东道国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前者关注投资的区位优势因素,以确保资本投入的安全、获得稳定的收益以及谋求更多的利润;而后者关注的是投资效应,即如何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商投资,从而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但跨

国公司的FDI动机与东道国投资效应却共存于东道国投资环境中,两者的关系应该是互为因果并相互促进的。

二、FDI与区域投资环境优化的协调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而对FDI行为及其区位动机与投资环境的双向作用进行研究,就是为了促进外资流量的增长以及区域投资环境和区域经济“质”的同步提高,实现区域经济系统总量增长、结构演进和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优化。这里“量”的增长不仅指吸收FDI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应加速外资由劳动力寻找型向市场寻找型、效率寻找型和战略资源寻找型的转变以及产业关联程度的深化。“质”的提高,是指投资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增加和区域产业系统的演进,是投资活动对区域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反映。一方面,区域投资环境的每一个诱导因素的变化都会对FDI动机产生一定的影响,引导着外商投资的方向、数量和结构,主要表现为投资项目数量的增加、行业门类的齐全、产业关联程度的加强以及投资结构的转变。另一方面,从投资环境的区域空间来看,它不仅是自然空间,更是蕴含着社会环境的空间。而在社会环境中,又以有关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法律对FDI产生的影响较直接。它主要反映为区域政策、区域体制以及区域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区域投资环境“质”的提升。具体表现在投资边际效率的提高、以项目为核心的区域产业群的集聚发展、行业部门分工合理化、壁垒消除,最终趋于空间一体化,为区域“质”的提高创造条件。这种“量”与“质”的同步优化,有时会因具体时间和区域的投资环境主导力量的差异而呈现出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在相当长时期(1979~2000年)内,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相应地,这一时段内90%以上的FDI集中于此。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制度环境的优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行政效率的改善,形成了FDI与投资环境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良性循环局面。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将提高本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市场的容量,并有利于改善外部条件,产生并集聚经济效益,从而进一步增加FDI的流入。这样,就在FDI、区域经济增长和投资环境改善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累积效应。

当前,国家经济发展的着眼点逐渐由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北部推移,同时伴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在这种发展契机下积极引导FDI投向中西部、东北部地区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西部地区FDI比重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FDI动

我国资信评估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浅见

西北政法学院 张荣刚

一、制约我国资信评估市场发展的因素分析

1. 社会信用服务体系不完善。

首先,以政府为主导的征信机构没有适时产生。资信评估机构在进行信用风险分析度量的过程中,需要得到较为完备的信用信息,并对信用信息特别是宏观上的信用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甄别、整合。以政府为主导的征信机构的缺位,束缚了资信评估机构业务的拓展和机构实力的增强。目前,人民银行正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基础信用信息系统数据库,但该数据库建成后何时对资信评估机构开放,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其次,资信评估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有关资信评估的法律法规较为分散,相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证券法》、《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贷款通则》以及配套法规规章的条款中。但这些法律法规所涉及的评级对象主要是发放债券和取得贷款的企业,且关于评级的强制性规定较少。在评级实务中,对作为服务对象的一般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缺乏系统的法律制度予以规范。

再次,业务对象范围阻碍了资信评估机构的发展。当前我国资信评估市场主要包括企业资信评估市场和证券资信

评估市场,目标客户群规模过小成为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企业评级市场的客户主要是银行内部信用级别较高的贷款企业,各类金融机构、银行内部信用级别较低的工商企业以及其他咨询类企业尚未进入评级范围。证券评级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债券,而其他证券如股票、政府债券、商业票据等尚未进入评级范畴。

最后,业务范围同样也限制了资信评估市场的发展。评级结果的服务对象应是投资者、政府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其中,政府主管部门对开展评级的要求是产生评级需求的主要动力。但目前政府主管部门并未要求对所有企业都进行评级;监管机构才刚刚开始使用评级结果,对评级业务需求有限;主要是由投资者来承担投资风险机制存在的缺陷,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影响了投资者对评级结果的使用。

2. 结构性供需失衡使资信评估机构竞争力低下。

一方面,市场认可度低,需求总量严重不足。目前我国处于信用缺失状态,从表面上看,资信评估市场难以启动的原因是我国信用制度不够完善、企业对资信评估的潜在意愿不强以及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证券种类少且规模小,特别是与评级直接相关的债券市场发展缓慢。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

机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东南沿海地区成功的合资企业范例和相关企业集群使得其具有持续引进 FDI 的相对优势。这种循环累积符合克鲁格曼所描述的区域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特性。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中西部地区即使具有和东南沿海地区完全相同的投资环境,在吸引外资上也存在着明显不利。因此,如何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将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为 FDI 提供了更多的区位选择机会。当前,中西部、东北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严重制约着资源与劳动力相对优势的发挥。今后除了要继续搞好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应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通过制度创新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 FDI“量”与“质”的同步优化。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FDI 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共同说明了东道国区域投资环境与 FDI 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促进作用。因此,优化区域投资环境,进一步提高利用 FDI 的水平和效率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为了提高 FDI 对东道国产生的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政府应该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市场建设等手段改善投资环境,增加跨国公

司的投资信心。

(1)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下确立动态引资目标。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都是遵循着取长补短、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的原则而进行的。我国的引资目标应基于正确认识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一基本国情而确立,并建立起 FDI 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这才是 FDI 发展的真正动力。

(2)在一定范围内逐步放宽对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与所有权限限制,提高子公司在跨国公司总部的战略地位,鼓励跨国并购,提高战略资源寻找型投资的比重。

(3)注重 FDI 政策与其他政策的配合和相互协调。我国对 FDI 的激励政策以财政政策即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为主,而发达国家吸引 FDI 却都采用金融政策,如为大型项目提供出口信贷担保、低息及补贴性信贷,针对汇率波动、货币贬值等特殊风险提供优惠保险等。这也是导致我国 FDI 利用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区域发展历史、基础条件、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的发展中大国,因此如何根据各区域特点,针对特定区域的投资环境进行相应的效应分析与优化建模是涉及到决策参考的复杂问题,这也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方向。□